

#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 ——十六世纪手稿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

翻译：王锁英

评介：艾思娅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1998 年

#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十六世纪手稿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

王锁英 译

责任编辑：黄宪萍 顾问：余 安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6月第一版 199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135千字 印数：10000册

书号：ISBN 7-80564-916-2/K·30 定价：16.80元

不变的；政治家可以是或者变成商人；所有的人，往往是出于生存的需求，可以变成冒险家。当时，他们所处的是一种变换的或相互作用的制度，这就造成并激发了不同的交往模式，并由此而产生了形态各异的叙述形式：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甚至史诗，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杰出群体。其中的每一篇文字实际上都有可能自成为一种新的体裁，在葡萄牙 16 世纪、17 世纪旅行文学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些叙述性体裁可以表现为航海日记、旅行指南、报告、见闻、信件、专著、编年史等等。

当欧洲人到达亚洲世界时，他们发现这里已经是一个“老世界”<sup>①</sup>了；正是他们，把中世纪的欧洲人根据过去作品的描写而造就的虚幻的世界变为实体，这些过去的作品包括英国人约翰·德·曼德维尔（John de Mandeville）在 1360 年写的书，他又被称作假曼德维尔（pseudo-Mandeville）；法国的圣路易派往蒙古首都喀喇昆仑的使者方济各修士威廉·冯·鲁布卢克（Wilhelm Von Rubruk）写的《旅行指南》；皮安·德尔加皮诺（Pian del'Carpino）和其他游僧的记述；最后是

---

① 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欧洲人将美洲称为新世界，以别于欧洲这个老世界或旧世界。

#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 评介：作家及作品

说起旅华的葡萄牙人，免不了要提到长长的一列人，从传教士到政治家，直至商人，甚至纯粹的冒险家。这些人总计数百人，而每一个人又以自己的方式，描述、澄清、完善、甚至推翻了那些传到欧洲的富有想象力的或走样变形的有关中国的记述。

因为不可能逐个提到所有的人，我们尝试将他们划分归类，政治家、传教士以及商人兼冒险家，这些人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但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却并不因为目标不同而不同，他们的身份也并不是一成

## 一、政治家

正是政治家们要尝试克服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的困难，由此而开始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最终导致了在 1554 年建立上帝圣名之城澳门。

被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于 1508 年首次派往中国的葡萄牙使者是迪奥戈·洛佩斯·德·塞盖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他以马六甲和印度为基地进行活动，但未能到达中国国土。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葡萄牙人，都未能找到进行交往的最好模式，因为要通过交谈或书写来沟通是不可能的。所以迪奥戈·洛佩斯·德·塞盖拉所提供的信息笼统、空洞，对葡萄牙人通过贸易活动（当时已能在马六甲购到瓷器和丝绸）已经间接了解到的情况并无新的补充。

只是在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于 1513 年攻占了马六甲后，才组织了一次远征，从海上去中国。远征的指挥官是若热·阿尔瓦莱斯 (Jorge Alvares)，但他没有越过广东入口处的屯门岛（又称贸易岛），未能完成远征就死了。他在岛上留下了一块纪念石碑，证明他曾到过该地。直到两年之后，即 1515 年，拉斐尔

《马可·波罗游记》，它在欧洲的流传极广，在葡萄牙则代表着一种动力和一个挑战，很可能是唐佩德罗王子<sup>①</sup>（唐若奥一世的儿子和唐恩里克王子<sup>②</sup>的哥哥）将此书引入葡萄牙，并将它放入王家书店的。

所以在当时，并不是一些全新的形象在被塑造起来，而是以往的老形象在被更正、被确认或被推翻，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实现神话，提供范例，造就乌托邦。

如果说，当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民相遇时，他们相信自己是遇到了人类始祖亚当的同代人，接近原始的愚昧，那么与此相同，亚洲各民族及其极为丰富多姿的文化，从印度斯坦和苏门答腊起，经过神秘而迷人的中国，直至日本，则以某种方式代表了一个稳稳坐落在各种神圣化机构之上的人类。他们拥有一个如此晶莹、精粹的文化和思想宝库，相形之下，欧洲人（据我以为，诸如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及其伙伴）便成为外来的、怪异的、野蛮的人，对一个在很多世纪里层层形成的文明的规则 and 标准一无所知。

因此，在我们划分的类别中，我们要首先提到政治家们。

---

① 曾担任葡萄牙的摄政王。

② 为葡萄牙航海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

师，这个职业是家族的遗产，因为他的父亲是唐若奥国王的药剂师。他于 1511 年出发去印度，于 1512 至 1514 年间生活在马六甲，也许正是在那里他开始撰写《东方简介》(Summa Oriental) 一书。他出发去了柯钦，后来在 1517 年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他几乎已经开拓了道路，至少能与中国结成贸易联盟，然而，似乎由费尔南·德·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引起的外交困难中止了这一切。<sup>①</sup>费尔南·德·安德拉德回到了葡萄牙，而托梅·皮雷斯则留在了中国，等候命令。在等待了 19 个月后，他失去了音信，当于 1540 年左右的某一天死于某个地方。然而，他留下了他在东方的见证：《东方简介》。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充满了对于东方土地和习俗的详细描写，还有一封致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的信，描述了东方的药用植物及其来源和性能。但他留下的不止是这些，他还留下了一支中葡后裔，其证据就是与大冒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萍水相逢的伊内斯·德·雷利亚。正如 20 世纪的诗人阿丰索·洛佩斯·维埃拉(Afonso Lopes Vieira, 1878—1946)所写的，伊内斯·德·雷利亚身上的“中国味浓，远远超过其葡国

---

① 参见书中页(128)注释(1)和页(163)注释(1)。

·佩雷斯特罗 (Rafael Perestrelo) 才又去那里。1517年,托梅·皮雷斯 (Tome Pires) 大使在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 (Fernão Peres de Andrade) 的陪同下,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向中国皇帝递交联盟信。与托梅·皮雷斯同行的还有六个葡萄牙人:杜亚尔特·费尔南德斯 (Duarte Fernandes)、弗朗西斯科·德·布利奥斯 (Francisco de Bulhões)、克里斯托翁·德·阿尔梅达 (Cristóvão de Almeida)、佩德罗·德·法利亚 (Pedro de Faria)、若热·阿尔瓦莱斯 (Jorge Álvares) 以及克里斯托翁·维拉 (Cristóvão Vieira),这最后一个实际上是皈依基督教<sup>①</sup>的印度人。此外,还按惯例带了五名“舌头”(翻译)。

葡萄牙最伟大的东方历史学家若奥·德·巴洛士是这样描写葡萄牙人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的:“因为唐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命令费尔南·安德拉德了解孟加拉海湾和中国海岸的情况,所以首先要去广州城,它是中国的一个省会。”(见《亚洲·第三年代》第十编第六章)

我们来略施笔墨,写一写这些人中令人着迷的人物托梅·皮雷斯。他是植物学专家,也是国王的药剂

---

<sup>①</sup> 参见书中页(161)注释(1)。

## 二、传教士

这些人有数十人，属于不同的教团，如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修士就是多明我会的，他为唐塞巴斯蒂昂国王写了《中国情况及其特点详介专著》，于1569年在埃武拉出版（里斯本的国立印书局暨货币之家在1989年出版了拉斐埃拉·迪英蒂诺的校译本）。然而，绝大多数传教士是耶稣会成员，是他们提供了各类信息，有关语言、科技、地理，特别是有关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正是这样，我们才可以在16世纪的北京朝廷里看到一个名副其实的由耶稣会天文学家组成的班子，其中突出的有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和马努埃尔·狄亚斯（Manuel Dias）两位神父。

安文思神父是贝都冈人，与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一起领导所谓“数学院”。在那里，传教士们配合指导150至200名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中国居住37年后，这个耶稣会士于1677年在北京去世，按中国的礼仪下葬，极为隆重。

马努埃尔·狄亚斯神父是卡斯特洛布兰库人，于1610年至1659年间在中国工作。他去世时已享有圣

味”。且让我们来看看费尔南和她是怎么相逢相识的：

葡萄牙人即费尔南及其五六个同伴在去南京的途中遭复舟之难，被抛上岸边。伊内斯·德·雷利亚是周围“人群中”的一位妇女，向他们“施舍了两个码子”，就“像对待穷人一般”。然而，伊内斯·德·雷利亚从他们的说话中听出了他们是葡萄牙人，她想让他们也知道她，却又不知怎么说，于是她“解开……袖口，卷起袖子，让我们看刺在胳膊上的一个十字。”

接着，她“双手高举，高声说道：‘我们的在天之父，圣名永在。’这是用葡萄牙语说的，旋即又讲中文。”（《游记》第91章）

托梅·皮雷斯是作为政治家去中国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一星半点的资料，他出发去东方时已是鳏夫，没有在葡萄牙留下子女。他的使命无疑是个失败，最后甚至连累他在广州成为阶下囚。但是作为一个世人，他适应并融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在那里留下了后裔，并把葡萄牙语和基督教信仰作为遗产传给了自己的女儿伊内斯。

### 三、商人兼冒险家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冒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就是冒险家的典型。他除了是商人和冒险家，也做过传教士（与沙勿略神父一起）和大使。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游记》与那些专著、报告、见闻属于同一时代，堪称超语言交往的一部名副其实的“多语”词典。全书的一个个章节代表了其复杂的行程。他在果阿、马六甲、广州、北京、日本和苏门答腊之间穿梭往来，随着一章章的铺展，其举动、姿态、行为逐渐变得具有意义，使人能够领会起初无法理解的其中含义。

从一方面讲，世上存在着符号和符号系统，使得人们的交往能够以我们认为普遍通用的信号为基础，如下跪、举手、流泪等。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在某些场合所面临的是特殊的和特定的信号，要求花力气去理解和领会，如“把手指含在嘴里”、“把手举到额上”、“拔胡子”、“拍打大腿”、“晃脑袋”、“抬起眼睛”等，这些动作包含的是许许多多的信号或语码，要

人的声誉。他用中文出版了好几部数学专著和一部《天文论》。他还翻译了在礼拜日和节日弥撒中读的福音书。关于这一翻译，有一个评价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部关于圣书的翻译……即使在文人的眼里，也被视作是文字流畅的典范。”（《在华出版物书目》，巴黎，1901，第22页）

弗朗西斯·罗德里杰斯（Francisco Rogrigues）在概要论述葡萄牙天文学者在华情况（1583—1805）时，还特别提到徐日升（Tomás Pereira）、麦大成（Francisco Cardoso）和其他一些神父。他们善于将发展新教徒的热忱与科技工作结合起来，博得了中国人的钦佩，特别是在预测日月食一类的现象方面。1732年，皇帝本人想亲自观察在那一年发生的日月食现象。徐懋德神父（P.<sup>e</sup> André Pereira）在致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年报》里对此作了这样的描写：

“日月亏食的日子终于到了，结果证实所观察到的现象完全符合我们的预算，欧洲人获得了极大的荣耀，而朝廷显贵们的钦佩也丝毫不小……”（《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澳门文化司署，1990，第38页）。

也没有人懂得我们的语言。”于是，双方用好奇心回应好奇心。但是，虽然东方人位于自己的土地，大权在握，却在认识方面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只能了解欧洲人想让他们了解的东西，没有可能去证实。而欧洲人，在某种形式上，用自己的知识和意愿来对付对方的权势。请看以下这个例子：

“在丰宝城，我们随安里克及 40 个葡萄牙人去了公主居住的地方……他命我们坐在一些席子上……向我们打听……一些新鲜好奇的事情……葡萄牙国王在印度的权力大不大，那里有多少个要塞堡垒及其位置，以及许多类似的事情。”接着又写道：“她对我们的回答表示非常满意。”

所以，鉴于所谈事物不在当地，当地人无法去证实欧洲人所表现出的自我形象。总之，这是欧洲人根据场合所希望留给别人的形象，或是另一方期望对方留下的形象。这是一种夸张的形象，是根据当时的利害关系，或褒或贬，战略性地表现自己。请看下面这一例子：

“南大金又……向我们详详细细地询问了很多事情，我们的回答主要是投其所好，而不是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作者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以免破坏我们的祖国在他心目中的声誉。”于是，现实继续被夸张：

观察者去解码、理解，并最终进行重复和模仿，以便尝试适应其他群体的文化，或融入进去，努力进行交往，使接触生效。

从定义上讲，《游记》中的欧洲人是外国人，是“不同者”，远道而来，既无地盘，也无权力。的确，说起东方人对于欧洲人的印象，具体地说是指对葡萄牙人的印象，一些看起来构成其特点的东西根本上是出于一种不同的眼光，以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为基础。这一印象的建立不仅仅限于在运用眼光这一信息工具的第一阶段，而且也包括第二阶段，即言语阶段。因为无法进行实地考证，东方从一个局部性的事物出发，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虚幻印象。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方对于 15 世纪、16 世纪的欧洲人已是一个“老世界”，那么对于东方人来说，欧洲才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谜一般的世界，与其说欧洲去发现，不如说欧洲被发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欧洲自己去让人发现。对于东方人来说，欧洲才是世界的尽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世界，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者。“有关这一方面，”费尔南·门德斯在书的第 115 章写道，“我们是外国人，来自遥远土地上的一个遥远国家，一直到那时为止，那里对我们一无所知，既没有任何书籍或文字提到我们的名字，

帝创造世界财富的地方所生活的民众。”

在我们看来，虽然上面谈到的某些场合已不代表互相交流中的“零点”，但不管怎样，是在根据非语言信号、传送和接受信息。那么，当旅行者渴望进入和掌握外国人民的语言而迈出语言的一步时，“游”便变成了“说”。有时，这是生存的战略，正如从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修士的文章中抽出的这一段所写的：“已经有好几天在向葡萄牙人要这东西了，然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对这东西的称呼，最终互不明白……”对异国的、新鲜的和陌生的事物感到好奇，用作者的原话说，是为了让“以前隐蔽的东西一清二楚”。这是诠释学方面的一个挑战，是语言学方面的一种本能：“中国人在书写中没有固定字母，因为写出的都是图形，一笔一划地写，所以说他们有很多字，每个字表示一个意思，于是一个字表示天，另一个字表示地，还有一个字表示人。对所有的东西都这样表示。然而，应该知道，他们也使用某些字来表示外国的或似乎是外国的名称。在中国有很多种语言，说起话来互不明白，包括交趾支那人与中国人、日本人与中国人都言语不通，但通过文字他们都能相通……我曾多次和人谈起，为何那么多人通过文字互相交流而通过说话却不能沟通，但我们一直没有能够弄明白其中道理，直到有一

“他首先对我们说，中国人和琉球人告诉他，不论是国土还是财富，葡萄牙都大大超过中华帝国，我们承认这是事实。他接着说，别人也向他保证说，我们的国王通过海上远征，占领了世界的大部分土地，我们也说这是事实。他又谈起第三件事，即别人向他肯定说，我们的国王拥有大量的金银，甚至将两千多间屋子直堆到顶。对此我们回答说，两千间屋子这个数字我们不能肯定，因为我们的疆土和王国本身是如此辽阔……所以无法得出确切的数字。”

因为不是亲眼目睹，所以用语言杜撰的事物来填补现实的空白，造出了一个无法考证的虚幻世界。

这是一种褒扬性的自我写照，它可以在一段预兆性的、甚至是预言式的话语之后应运而生，以对话的内容进行确认。这种情况以某种方式使人联想起与攻占墨西哥有关以及奠定这一攻占的事件。下面这一段描写说明了这种情况：“（阿鲁国王）拥抱着我，非常高兴地说：‘我的好朋友，我向你肯定，我整夜都梦见了我的主人葡萄牙国王的这一堡垒，它一直出现在我的面前，以至现在就在我的眼前。我期望上帝用它来保卫我的土地。’更具说明力的是南大金的话语：“要不是这些成持科济人，我就没命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的书里写到：他们在水面上飞行，沿途征服了在上

□ 康乃馨译丛

括口译者和笔译者。这些人才是十六世纪大历险的主角，是在寻求消除通天塔语言混乱的现象<sup>①</sup>，是在寻求全球性的理解。

---

① 根据《圣经》记载，人类想建立通天高塔，上帝使大家语言发生混乱，互相言语不通。